

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 缓解研究*

——以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高 帅^{1,2} 史 焯¹ 唐建军³

摘要：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期，脆弱脱贫户和边缘户能否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需仔细审视。因能力匮乏、权利缺失导致农户贫困脆弱性不容忽视，增能赋权成为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路径，赋权是增能的先决条件，增能是赋权的物化体现。本文基于2018年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实地入户调研数据，从增能赋权视角出发，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修正，基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资源禀赋差异、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群体差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增能赋权均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增能赋权是缓解贫困脆弱性和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桥梁；（2）增能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陷入“新相对贫困”的尴尬处境，赋权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滋生“灯下黑”现象；（3）赋权对缓解贫困户贫困脆弱性效果更明显，生产权利和就业权利赋权将缩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

关键词：增能赋权 贫困脆弱性 可持续生计 脱贫攻坚 连片特困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已经处于决战决胜时期，贫困边缘群体的贫困脆弱性亟待关注。毋庸置疑，近年来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按照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即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11年不变价2300元，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249万人（2013年末）减少至1660万人（2018年末）^①，贫困发生率降至1.7%。然而“政绩脱贫”“限期脱贫”等压力可能导致扶贫工作失真，脆弱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太行山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动态测度与精准扶贫成效评估研究”（17CJY035）资助。特别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唐建军。

^①1986年中国绝对贫困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206元，2000年提至865元，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贫困标准提至2300元。本文关注精准扶贫以来农村贫困状况，贫困标准维持2011年可比价格下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不变。

脱贫户能否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与此同时,近年来精准扶贫工作重点聚焦贫困户(建档立卡户),扶贫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程度失衡,对低收入非贫困人群(边缘户)关注较少(刘斐丽,2018)。实际上,贫困边缘群体(脆弱脱贫户及边缘户)生计资本有限,应对风险能力较弱,贫困脆弱性程度较高,贫困户脱贫后可能再次返贫、非贫困边缘户易于陷入贫困。贫困边缘群体贫困脆弱性亟待关注,这不仅是对已有减贫成效进行巩固提升,而且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奠定基础。《“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要求将解决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内容,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应聚焦扶贫工作中非贫困户因收入略高于贫困标准而缺乏政策支持等问题。当下贫困人口多为深度贫困人口,贫困脆弱性较大,脱贫难度大幅增加。针对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的探讨,具有时代紧迫感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贫困研究中,收入贫困或多维贫困皆是对以往贫困状况进行衡量,针对未来贫困的衡量较少,贫困脆弱性可对家庭未来福利、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能力等进行刻画(韩崢,2004)。当前处于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国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将贫困脆弱性缓解纳入减贫工作视野,有助于增强现有减贫成效的稳定性,降低未来贫困发生可能性(檀学文、李成贵,2010)。能力、权利对贫困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者既是农户致贫的重要原因(阿玛蒂亚·森,2001),又是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的有力支撑。已有贫困脆弱性研究从个人能力、权利视角的论述较少,因此,本文拟采用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入户调研数据,基于增能赋权视角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本文可能的贡献是:(1)从增能赋权视角出发,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权利体系框架,结合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现实,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2)利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2018年)的实地入户调研数据,探析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机理,为缓解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提供决策参考,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摘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贫困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

随着反贫困理论不断发展,学者逐渐将研究目光从观察贫困转向预测贫困,由家庭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及风险等因素导致的贫困脆弱性被纳入研究视野(Morduch,1994),并在此基础上将贫困脆弱性明确为个人或家庭遭受风险冲击而引起福利损失的可能性(World Bank,2000),进一步研究表明贫困脆弱性本身具有一定前瞻性(Alwang et al.,2001;万广华、章元,2009)。目前贫困脆弱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贫困脆弱性定义并未完全达成共识,基于不同定义可提出3种测度方法(黄承伟等,2010),学者多使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来度量贫困脆弱性,而选取50%作为脆弱线更具预测精确性(万广华、章元,2009)。

在阿玛蒂亚·森研究基础上,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发展研究所提出从可持续生计角度看待贫困脆弱性。之后,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学者开始在家庭脆弱性与生计资本之间建立分析关系(Dercon,2001),厘清分析框架及生计途径,阐释可持续生计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李斌等,2004)。众多学者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展开讨论,从人力资

本视角来看, 是否接受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周亚虹等, 2010)、健康水平(俞福丽、蒋乃华, 2015)、营养状况均对农户生计产生一定影响(张车伟, 2003); 从金融资本视角来看,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丁志国等, 2012), 金融普惠将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 对缓解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张栋浩、尹志超, 2018), 但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脆弱性加剧(崔艳娟、孙刚, 2012), 贫困边缘群体缺乏申请贷款的权利与机会(程恩江、刘西川, 2010); 从物质资本视角来看, 物质资本对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程名望等, 2015),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作用(何仁伟等, 2017), 但公共服务投资在偏远山区发挥作用可能有限(徐定德等, 2016); 从自然资本视角来看, 生计越脆弱的农户对自然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段伟等, 2015), 生态与贫困之间存在耦合关系(Liu et al., 2007), 生计资本薄弱的农户因过度利用自然资本导致生态退化, 生态退化反过来影响农户生计并陷入恶性循环(何仁伟等, 2017); 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 社会资本是以上四类生计资本的联系纽带, 不但对增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叶静怡、武玲蔚, 2014)、促进外出务工及缩小村庄之间收入不平等均产生积极影响(郭云南等, 2014), 而且社会资本可能为农户提供非正规的金融支持(谭燕芝、张子豪, 2017), 是农户平滑消费流的重要手段(杨汝岱等, 2011)。也有学者认为, 社会资本在贫困人口之间互相交换并不能缓解贫困状况, 反而加剧收入不平等(Lin, 2001)、扩大收入差距(周晔馨, 2012)。可持续生计五边形(见图1)中心点为极端贫困, 当农户生计资本欠缺时生计资本五边形将内缩, 生计资本内缩后低于贫困标准导致农户陷入贫困, 当生计资本五边形高于贫困标准时农户则实现脱贫, 生计资本五边形达到均衡状态, 农户就实现了生计可持续(胡晗等, 2018)。

综合来看, 有关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中, 从资产及生计资本视角来看, 农户生计资本匮乏直接导致贫困脆弱性加剧, 多种资本缺乏型农户最脆弱(李小云等, 2007), 收入增加是缓解贫困脆弱性最直接的途径, 社会资本提升对缓解贫困脆弱性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杨文等, 2012), 提高资产使用率及农户的资本禀赋对降低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影响(万广华等, 2014), 但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有限(樊丽明、解垚, 2014)。从冲击视角来看, 健康冲击导致生产性支出减少、能力投资下降(方迎风、邹薇, 2013), 健康冲击下零利息民间借贷未对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积极影响(许庆等, 2016), 环境脆弱性加剧产生的外部性冲击(郭劲光, 2011)、大学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均对家庭脆弱性缓解产生负向影响(杨文等, 2012)。家庭规模是不同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聂荣、张志国, 2014; 杨龙、汪三贵, 2015)。实际上, 资产绝对限制和应对风险能力限制可能导致贫困脆弱性更加严峻(Alwang et al., 2001), 贫困脆弱性加剧对人力资本形成、收入增加等均产生持久性的负向影响(黄承伟等, 2010)。

反贫困政策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农户的发展能力与发展机会。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 已有贫困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研究较为丰富, 然而多聚焦于冲击、资产及生计资本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以及提升生计资本对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分析等, 可大致归纳为“农户发展能力”研究范畴, 相关文献普遍对“农户发展机会”关注较少。“是否具备发展能力”与“能否拥有发展机会”均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 调研中笔者发现, 当前贫困村、贫困户是脱贫攻坚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贫困边缘群体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是否具备发展能力”不被重视, 而“能否拥有发

展机会”几乎完全游离于精准帮扶视野之外,学界和扶贫实践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能否拥有发展机会”。

(二) 增能赋权、贫困脆弱性缓解与可持续生计形成机理

扶持政策缺位和短视加大了边缘户的心理落差,这不但影响农户能力提升的主观意愿,而且导致农户在参与贫困户认定等民主权利表达时积极性不高,就业帮扶权利被剥夺,这些均可能对户主就业及生计改善产生不利影响。针对具有发展机会却缺乏发展能力的群体“增能”,针对具备发展能力却缺乏发展机会的群体“赋权”,增能赋权协同并进有助于促进太行山区农户形成可持续生计。

增能是农户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内生基础。能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进入信贷、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等能力)被剥夺是贫困人口贫困的根本原因(阿玛蒂亚·森,2001;德布拉吉·瑞,2002);应对风险能力匮乏是导致贫困人口持续贫困的重要因素(Barrientos,2007)。贫困边缘群体家庭生计资本相对较少,遭受风险冲击时不得不大幅缩减开支,甚至挤出对孩子教育的投资,这可能导致子女辍学等(韩峥,2004)。针对结构性贫困脆弱性,暂时性收入、公共转移支付缓解作用有限(樊丽明、解垚,2014),增能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长效措施,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决定了农户稳定增能的可能性。能力可分为主观能力与客观能力,主观能力是基于个人意愿和能动性表达的能力,受意愿影响较大,可以理解为农户“想不想发展”的能力;客观能力是指农户受自身禀赋限制的能力,受客观条件影响较大,可以理解为农户“能不能发展”的能力。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不可或缺,因此,本文将同时分析主观能力与客观能力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赋权是农户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外生保障。阿玛蒂亚·森(2001)论证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就业权利、以继承或转让为基础的权利对于摆脱贫困的重要性,森认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缺失。权利边缘化导致贫困边缘群体缺少发展机会,在资源分配上丧失发言权。后华盛顿共识进一步明确“赋权”概念(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5),世界银行提出公共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机会均等、提供机会与赋权(World Bank,200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可持续生计的目标之一是赋权。贫困边缘群体已享有权利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计资本及资源禀赋(阿玛蒂亚·森,2001),实际上,尽管当前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贫困边缘群体仍未充分享有机会均等的发展权利,特别是具备发展能力的贫困边缘群体权利缺失的现象更为普遍,因而机会均等的赋权刻不容缓。结合调研实际及相关研究,本文将重点分析农户的民主权利、生产权利、交换权利与就业权利对太行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增能赋权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策略,赋权是增能的先决条件,增能是赋权的物化体现。综合来看,农户拥有机会均等的发展权利,增能的可能性更大;拥有发展能力,则需要机会均等的权利保障。农户生计资本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能力强弱,而生计资本较弱的农户可能更加缺乏发展机会,能力匮乏、权利缺失导致农户贫困脆弱性不容乐观。提升主观能力与增强客观能力有助于增能,保障民主权利、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及就业权利有助于赋权,增能赋权双动力带动贫困边缘群体形成可持续生计,继而实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生计结果。增能赋权是缓解贫困脆弱性和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可行路径,其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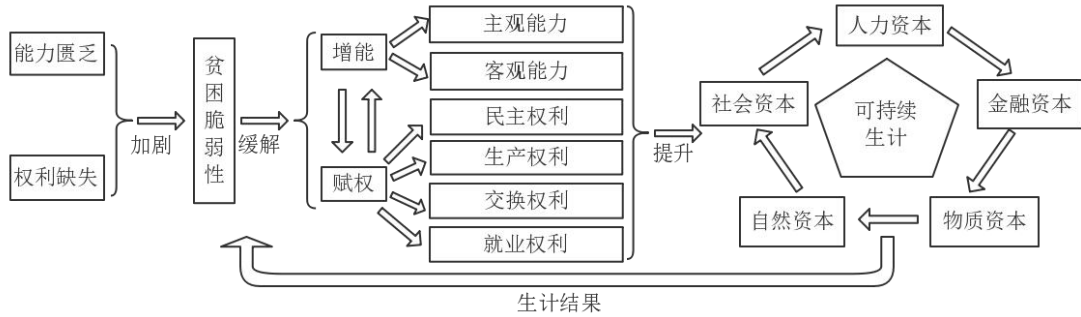


图1 增能赋权、贫困脆弱性缓解与可持续生计形成机理

三、数据说明、变量设置与方法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笔者对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两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实地调研，调研方式为“一对一”入户访谈。综合考虑经济状况、地理位置、扶贫政策等多种因素，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和大同市大同县（现云州区）最终被确定为样本县。在此基础上考虑样本分布，力求调研数据的随机性与全面性。根据2015年人均收入水平，每县选取4个乡镇（经济水平较好和较差各2个乡镇），每乡镇选取4个村（距乡镇较近和较远各1个贫困村，以及分别与这2个贫困村临近的非贫困村），每县共抽选16个村。根据村组大小和地理分布，村内进行随机抽户，每村完成16份左右问卷，实际样本总量为542户。

(二) 变量设计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VEP法测度太行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将农户*i*在*t*期贫困脆弱性定义为该农户在*t*+1期收入水平可能低于贫困线的概率（Chaudhuri, 2002; Kühl, 2003）。本文用*V*来表示贫困脆弱性，公式定义如下：

$$V_{it} = \int_{-\infty}^z f(y_{i,t+1}) d(y_{i,t+1}) \quad (1)$$

(1)式中， $y_{i,t+1}$ 是农户在*t*+1期的未来收入， z 是贫困线， $f(y_{i,t+1})$ 是未来收入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已有研究证明对数正态分布适用于描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Singh and Maddala, 1976; 万广华、章元, 2009），因此贫困脆弱性可进一步表达为：

$$V_{it} = \int_0^{\ln z} f(\ln y_{i,t+1}) d \ln y_{i,t+1} = \Phi\left(\frac{\ln z - \mu \ln y_{i,t+1}}{\sigma \ln y_{i,t+1}}\right) \quad (2)$$

(2)式中， $\Phi(\cdot)$ 为正态分布函数， $\sigma \ln y_{i,t+1}$ 为未来收入对数的标准差， $\mu \ln y_{i,t+1}$ 为未来收入对数的期望（叶初升等, 2014）。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使用持久性收入作为未来收入的期望估计值（万广华、章元, 2009），使用现有收入水平的标准差作为未来收入标准差的估计值（Zhang and Wan, 2006）。结合实际及相关研究，本文将农户的种植收入、工资性收入、政府补贴（包括生产补贴、养老金等）

及政府救助（包括残疾补贴、五保收入等）之和视为持久性收入。鉴于代际间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影响作用有限（解垚，2015），暂时性转移支付不计入持久性收入。结合中国扶贫实践及国际贫困标准，贫困线分别采用山西省 2017 年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执行的年人均纯收入 3200 元的脱贫标准，以及世界银行提出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 1.9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从增能和赋权两方面选取核心解释变量。

增能变量包括提升主观能力与增强客观能力。提升主观能力是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的基础，也是农户可持续生计形成的前提。本文采用“请您对自家未来发展能力进行评价”来刻画主观能力，数值（1~5）越大表明农户自评未来发展能力越强。健康是农户客观能力的直观反映，健康冲击不但会对农户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可能导致农户对“能力”投资有限，进而加剧贫困脆弱性（方迎风、邹薇，2013）。本文通过“您家里是否有慢性病病人”来刻画客观能力，数值为 0 表明农户客观能力通常较好（家中无慢性病病人），数值为 1 表明农户客观能力通常较差（家中有慢性病病人）。

赋权变量包括赋予农户民主权利、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及就业权利。民主评议反映农户在村级治理中拥有的民主权利，贫困户民主评议结果取决于村级民主评议小组，这一结果不能由自身决定，可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本文选取“您村里的贫困户认定是否经过民主评议”反映农户的民主权利，数值为 0 表明贫困户认定未经过民主评议，数值为 1 表明贫困户认定经过民主评议。耕地作为太行山区农户自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户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耕地及由此形成的自然资本可能对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本文选用“您家的耕地面积”反映农户的生产权利，数值越大表明农户生产权利越大。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可能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一定影响，距离乡镇越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可能越好。本文选取“您家到最近的乡镇所在地距离”刻画农户居住地的物理通达性，数值越大表明距离最近的乡镇越远。市场可及性可能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进而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您家到最近的集市距离”刻画农户居住地的市场可及性，数值越大表明距离最近的集市越远，市场可及性可能越差。就业作为农户主要的生计手段，可能影响农户收入，进而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户主目前的就业状况”对就业权利进行刻画，本文将户主“仅务农”“务农为主，兼非农”“非农为主，兼农”以及“仅非农”四种就业状况认定为“已就业”，数值为 0 表明户主未就业，数值为 1 表明户主已就业。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已婚为 1，未婚、离异或丧偶为 0）、家庭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家庭总人口数之比），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维度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能力	<i>fda</i>	未来发展能力（量表，单位：分）	542	2.576	0.932	1	5
	<i>health</i>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542	0.546	0.498	0	1
权利	<i>democ</i>	贫困户认定民主评议	541	0.488	0.500	0	1
	<i>land_area</i>	耕地面积（单位：亩）	542	9.846	11.115	0	100

	<i>employment</i>	户主就业状况	542	0.799	0.401	0	1
	<i>township</i>	距最近乡镇距离 (单位: 公里)	542	5.050	3.160	0	20
	<i>market</i>	距最近集市距离 (单位: 公里)	542	12.874	11.546	0	50
控制变量	<i>age</i>	年龄 (单位: 岁)	542	62.286	11.044	25	92
	<i>gender</i>	性别	542	0.862	0.346	0	1
	<i>edu</i>	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539	5.403	3.383	0	19
	<i>marr</i>	婚姻状况	542	0.825	0.381	0	1
	<i>raising_ratio</i>	家庭抚养比	542	0.597	0.395	0	1
	<i>V</i>	贫困脆弱性	542	0.540	0.363	0.001	1

注: 贫困脆弱性测度选用的贫困线为山西省 2017 年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执行的年人均纯收入 3200 元的脱贫标准。

(三) 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能力、权利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需要估计的计量模型如下:

$$V_i = \beta_0 + \beta_1 fda_i + \beta_2 health_i + \beta_3 democ_i + \beta_4 land_area_i + \beta_5 employment_i + \beta_6 township_i + \beta_7 market_i + \beta_8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3) 式中, V 为贫困脆弱性, fda 、 $health$ 为能力解释变量, $democ$ 、 $land_area$ 、 $employment$ 、 $township$ 、 $market$ 为权利解释变量, X 为控制变量, ε 为随机干扰项。由于能力变量与贫困脆弱性互为因果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本文拟引入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估计 (3) 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 (Woodridge, 2015)。实证估计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将内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和其它所有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OLS 估计并得到内生变量的估计值; 第二阶段, 将贫困脆弱性作为因变量, 内生变量在第一阶段的估计值与其它所有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OLS 回归得到最终估计结果。在工具变量选取方面, 根据工具变量必须与内生变量 (fda) 高度相关但与贫困脆弱性 (V) 无关联的必要条件, 本文选取“亲朋中村干部数”“务工可求助亲朋数”两个工具变量, 原因是农户亲朋中的村干部数、外出务工时可求助的亲朋数可能会对农户自评未来发展能力产生影响, 但不会对基于收入水平的贫困脆弱性产生直接影响。另外, 本文对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划分^①均根据国家标准。本文采用分组回归方法, 分别从整体样本、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太行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分析。

^①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24号), 贫困村识别条件为: 该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省贫困发生率一倍以上; 该村 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所在省平均水平的 60%;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建档立卡户识别条件为: 以 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736 元 (相当于 2011 年 2300 元不变价) 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准。

四、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8年5~6月笔者在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获取的实地入户调研数据,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检验值较为理想,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值为8.58,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检验值为6.76,同时“亲朋中村干部数”“务工可求助亲朋数”这两个工具变量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Hansen J 检验值为1.53 ($p=0.22$),表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与(3)式中的残差项无关的原假设,换言之,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有效性较好。另外,基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资源禀赋差异、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群体差异进行分组回归,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影响方向基本符合预期,回归结果详见表2和表3。

第一,从整体样本看,未来发展能力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表明提升农户自评未来发展能力对缓解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作用。这与尤亮等(2018)认为贫困人口发展必须借助外来援助,但在根本上应注重激发贫困人口渴望的观点基本吻合。提升发展能力是农户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催化剂,也是生计资本之间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提。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薄弱,“不想发展”可能导致农户陷入低生计水平“贫困陷阱”,提升“想发展”能力可以使农户克服“等靠要”与攀比等思想,从而更有意愿去改善自身生计状况。健康水平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表明家庭成员中患有慢性病的农户贫困脆弱性反而更小。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结合调研实际来看,家庭成员健康水平较差(如家中有残疾人)确实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不利影响,而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若控制得当,可能会影响劳动效率,但不会影响基于收入水平的贫困脆弱性。在农户发生既定医疗支出的条件下,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往往较高,这可能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精准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的重点工作之一为基本医疗有保障,并且政府已开始对慢性病家庭实行签约管理(如定期检查、送医送药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权利视角来看,民主权利对贫困脆弱性影响不显著,表明当前民主评议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民主评议理应是村社权力由集中向民主的良好转变,但实际上弱势群体可能缺乏基本的话语权,不能充分表达自身的意愿和诉求。在村庄内精英群体掌握扶贫资源分配的发言权的惯性下(邢成举、李小云,2013),农户表达民主权利过程可能受阻。耕地面积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表明耕地越多的农户贫困脆弱性越小,赋予农户生产权利对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户主就业状况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就业的农户贫困脆弱性较小,意味着促进农户就业有利于改善贫困脆弱性。农户距离最近乡镇和集市的距离均对贫困脆弱性影响不显著,表明物理通达性和市场可及性并未造成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实质性差异。从权利视角综合来看,政策制定者应保证农户基于耕地的生产权利,促进和改善农户的就业权利,从而使自然资本成为五大生计资本良性循环的基石。从实践中看,多数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可满足日常基本需要,务工收入成为农户增收和生计改善的重要支撑(盛来运,2005)。在此基础上即使其它生计资本有所欠缺,农户也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但自然资本匮乏将加剧农户贫困脆弱性。

第二,从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比较来看,耕地面积、户主就业状况依然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

影响,表明人均耕地较多和户主就业均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积极作用。提升农户自评未来发展能力对缓解贫困村贫困脆弱性影响依然显著,但提升农户自评未来发展能力对非贫困村贫困脆弱性影响不显著。造成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外生助力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形成发展合力,发展合力促使贫困村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但非贫困村获得的外力帮扶有限。调研中发现,贫困村享受较多的政策支持,帮扶资源倾斜力度较大。驻村工作队长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强压力机制下各种考核等使得贫困村的帮扶工作具有一定成效。在村级层面上,“是否”贫困村引起政策帮扶的显著差异,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效果明显。由于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帮扶责任人与农户接触机会更多,带来更多的信息和项目,在此基础上“扶志”容易对提升农户主观能力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非贫困村却处于政策扶持边缘,在精准扶贫战略下获得的政策支持更少。实际上,近年来聚焦于贫困村的精准扶贫持续发力导致部分非贫困村处于“新相对贫困”^①的尴尬境地,这不仅可能激化非贫困村与贫困村之间的矛盾,还可能形成一定的攀比、排斥甚至敌对心理。外生助力不足、内生动力匮乏导致非贫困村发展合力不足,农户自评未来发展能力未能对贫困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距最近集市距离对非贫困村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表明距离集市越远的非贫困村贫困脆弱性反而越小。产生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贫困村而言,非贫困村获得的扶贫支持较少,决策者可能认为市场可及性较好的非贫困村存在问题较少,在扶贫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决策者更加关注“边边角角”的非贫困村,这均可能导致市场可及性较好的非贫困村贫困脆弱性反而更差,从而滋生“灯下黑”现象^②。过于关注“边边角角”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区位较好的村庄获得扶持力度较小,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市场可及性越好反而贫困脆弱性越大。从增能视角来看,应继续巩固和提升贫困村发展能力,促进其对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积极影响,非贫困村亦需找寻影响发展能力的阻碍。从赋权视角来看,不能忽视市场区位较好的非贫困村发展较差的情况。

第三,从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比较来看,耕地面积和户主就业状况均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从变量的影响程度来看,耕地面积对贫困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比非贫困户更大,户主就业状况对贫困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比非贫困户更大,表明赋予农户生产权利及就业权利对贫困户贫困脆弱性缓解效果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贫困户“能否”利用“赋权”改善自身贫困脆弱性的问题,进一步证实了扶贫实践中保障贫困户生产权利的必要性,以及就业扶贫政策的合理性。从增能和赋权视角来看,增能在贫困户或非贫困户群体内部均未产生明显差异,赋予农户交换权利对缓解贫困户贫困脆弱性作用明显。可持续生计形成过程中,应稳固贫困户自然资本、提升其人力资本。距最近集市距离对贫困户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表明距离集市越远的贫困户贫困脆弱性越小。距最近集市距离对非贫困户贫困脆弱性产生的影响不显著,从非贫困户样本来看,距最近集市距离的均值和方

^①新相对贫困,是指在精准扶贫帮扶力度较大的情况下,原本发展较差的村庄及农户反而超越当时发展较好的村庄及农户,形成“干得好”不如“帮得好”的局面,从而产生新相对贫困的情况。

^②“灯下黑”原指照明时由于被灯具自身遮挡,在离光源很近的区域形成一定阴影,精准扶贫中的“灯下黑”是指在精准扶贫“点面结合、关注边角”要求下,帮扶可能更重视“边边角角”,反而产生市场条件较好的村庄发展较差的现象。

差相对更小。在非贫困户居住较为集中的情况下，距最近集市距离差异未引起贫困脆弱性的显著差异。

表2 整体样本 OLS 回归与工具变量法稳健性检验

	OLS 回归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回归	
	(因变量: V)	第一阶段 (因变量: fda)	第二阶段 (因变量: V)
未来发展能力	-0.035** (0.016)		-0.155* (0.091)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0.037 (0.027)	-0.192** (0.077)	-0.061* (0.033)
贫困户认定民主评议	0.003 (0.027)	0.214*** (0.076)	0.026 (0.032)
耕地面积	-0.016*** (0.002)	-0.000 (0.004)	-0.016*** (0.002)
户主就业状况	-0.155*** (0.034)	0.178* (0.101)	-0.133*** (0.039)
距最近乡镇距离	-0.003 (0.004)	-0.039*** (0.013)	-0.008 (0.006)
距最近集市距离	-0.002* (0.001)	0.010*** (0.004)	-0.001 (0.002)
年龄	0.000 (0.002)	-0.014*** (0.005)	-0.001 (0.003)
性别	0.018 (0.044)	-0.136 (0.123)	0.002 (0.049)
受教育年限	-0.005 (0.004)	0.011 (0.011)	-0.003 (0.005)
婚姻状况	0.066* (0.040)	0.361*** (0.105)	0.111** (0.051)
家庭抚养比	-0.232*** (0.051)	0.010 (0.128)	-0.233*** (0.054)
亲朋中村干部数		0.088** (0.035)	
务工可求助亲朋数		0.186** (0.073)	
常数	1.048*** (0.143)	3.048*** (0.331)	1.431*** (0.335)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值		8.58 (p<0.05)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检验值		6.76	
Hansen J 检验值		1.53 (p=0.22)	

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研究

样本数	538	538	538
R ²	0.335		0.257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将贫困线调整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 1.9 美元后发现，实证结果与表 2 大致相同，故不再赘述。

表 3 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研究分组回归结果 (2SLS)

		贫困村	非贫困村	贫困户	非贫困户
能力	未来发展能力	-0.053*** (0.019)	-0.006 (0.026)	-0.030 (0.021)	-0.031 (0.025)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0.063* (0.034)	0.024 (0.044)	-0.039 (0.033)	-0.033 (0.045)
权利	贫困户认定民主评议	0.035 (0.033)	-0.053 (0.044)	0.015 (0.032)	-0.027 (0.047)
	耕地面积	-0.014*** (0.003)	-0.019*** (0.003)	-0.018*** (0.002)	-0.014*** (0.004)
	户主就业状况	-0.171*** (0.042)	-0.095* (0.057)	-0.175*** (0.034)	-0.127* (0.068)
	距最近乡镇距离	-0.003 (0.005)	-0.007 (0.008)	-0.002 (0.005)	-0.005 (0.008)
	距最近集市距离	-0.001 (0.002)	-0.004* (0.002)	-0.002* (0.001)	-0.003 (0.002)
	常数	1.003*** (0.177)	1.096*** (0.229)	1.111*** (0.164)	0.908*** (0.25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353	185	318	220
	R ²	0.298	0.452	0.384	0.295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家庭抚养比）、工具变量和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与表 2 中基准回归的结果大致相同。将贫困线调整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 1.9 美元后发现，实证结果与表 3 大致相同，故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8 年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实地入户调研数据，从增能赋权视角出发，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修正，基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资源禀赋差异、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群体差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主要结论有：

第一，增能赋权均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增能赋权是缓解贫困脆弱性和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桥梁。从增能视角来看，提升农户主观能力对可持续生计形成具有良好的催化作用。增强农户客观能力可能是较为漫长的过程，而提升农户主观能力是当前更加迫切、更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赋权视角来看，赋权的意义在于增大农户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生产权利及就业权利对整体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积极作用。这既是对阿玛蒂亚·森权利贫困理论的证实，又进一步说明赋予农户生产权利及就业权利对于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性。耕地是农户自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需切实保障农户的生产权利。促进农户就业是缓解贫困脆弱性不可偏离的改进方向，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引导贫困边缘户就业，加强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灵活制定就业激励措施，因地制宜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当前处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持续稳步推进农户机会均等的赋权需进一步思考。基层组织中民主评议如何真正发挥作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压力倒逼民主评议机制得以执行，村干部在贫困户认定及动态调整中的顾虑多了，原本村干部一人决定或“人情关系户”的现象减少了。调研中发现“民主评议”作用正在显现，但真正成为有效的决策形式尚需时日。

第二，增能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陷入“新相对贫困”尴尬处境，赋权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滋生“灯下黑”现象。提升农户主观能力仅对缓解贫困村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作用，交换权利对市场区位较好的非贫困村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贫困村和非贫困村间应优化扶贫资源配置，特别是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更需重视均衡协同发展。对贫困村而言，“扶志”对贫困脆弱性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提升农户主观能力是改善当前及未来贫困状况的有效手段，外生助力与内生动力形成的发展合力可促进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对非贫困村而言，发展合力不足可能存在一定隐患。扶贫资源倾斜确实给贫困村带来显著改变，但可能导致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间发展失衡。调研中发现部分贫困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优于非贫困村，甚至形成了两种类型村庄间新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非贫困村农户的发展意愿与致富信心。脱贫攻坚聚焦于贫困村无可厚非，但在后续迈入扶贫巩固提升阶段，特别是从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视角来看，政策制定“因户施策”的同时不能忽视村庄均衡发展，并促进村集体带动能力与农户自身发展能力实现协同并进的良性互动。此外，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基础较弱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警惕非贫困村增贫、返贫现象发生。

第三，赋权对缓解贫困户贫困脆弱性效果更明显，生产权利和就业权利赋权将缩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赋予农户生产权利和就业权利涉及自我发展和带动发展两方面，本文实证分析证实了贫困户能更好地利用赋权改善自身贫困脆弱性，脱贫攻坚进程中政策制定者应切实保障贫困户生产权利。同时，政府应为贫困户就业创造有利条件，统筹兼顾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涉农创业和优化产业带贫能力，给涉农创业者政策支持的同时，给予其一定的带贫约束。在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产业带动、就业带动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就业扶贫过程中要注重构建和优化利益衔接机制，不应是简单的发钱发物。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政府应在产业发展和选择上下硬功夫。因地制宜为当地农户创造就业机会，以此来形成稳定收入，促进其形成可持续生计。

综上所述，游离于扶持政策之外的贫困边缘群体亟待关注，脱贫攻坚需进一步审视贫困边缘群体贫困脆弱性。增能赋权是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以及可持续生计形成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关键桥梁。贫困村已取得的减贫成果需进一步巩固提升，非贫困村缺乏发展合力的现象需引起重视。政策制定者在聚焦“精准到户”的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类型村庄之间的差异针对性施策。保障农户生产权利及就

业权利将缩小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已有减贫成果来之不易，贫困脆弱性不容忽视。增能赋权立足于当前贫困现实和深层次突出问题，是着眼于未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长效举措。持续关注贫困边缘群体可持续生计形成，是缓解贫困脆弱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 2001:《贫穷和饥荒》,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 程恩江、刘西川, 2010:《小额信贷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了吗? ——来自三个非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区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12期。
3. 程名望、史清华、Jin Yanhong、盖庆恩, 2015:《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 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第7期。
4. 崔艳娟、孙刚, 2012:《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金融研究》第11期。
5. 丁志国、徐德财、赵晶, 2012:《农村金融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吗》,《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6. 德布拉吉·瑞, 2002:《发展经济学》, 陶然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7. 段伟、任艳梅、冯冀、温亚利, 2015:《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自然资源依赖研究——以湖北省保护区为例》,《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8. 樊丽明、解垚, 2014:《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经济研究》第8期。
9. 方迎风、邹薇, 2013:《能力投资、健康冲击与贫困脆弱性》,《经济学动态》第7期。
10. 郭劲光, 2011:《我国贫困人口脆弱度与贫困动态》,《统计研究》第9期。
11. 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 2014:《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管理世界》第1期。
12. 韩峥, 2004:《脆弱性与农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第10期。
13. 何仁伟、李光勤、刘邵权、徐定德、李立娜, 2017:《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1期。
14. 胡晗、司亚飞、王立剑, 2018:《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15. 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 2010:《贫困脆弱性: 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农业技术经济》第8期。
16. 李斌、李小云、左停, 2004:《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农业技术经济》第4期。
17. 李小云、董强、饶小龙、赵丽霞, 2007:《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18. 刘斐丽, 2018:《地方性知识与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19. 聂荣、张志国, 2014:《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10期。
20. 盛来运, 2005:《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21.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2005:《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 李周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 檀学文、李成贵, 2010:《贫困的经济脆弱性与减贫战略述评》,《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23. 谭燕芝、张子豪, 2017:《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财经研究》第3期。
24. 万广华、刘飞、章元, 2014:《资产视角下的贫困脆弱性分解——基于中国农户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25. 万广华、章元, 2009:《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26. 解丕, 2015: 《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与贫困脆弱性》, 《经济管理》第3期。
27. 邢成举、李小云, 2013: 《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
28. 徐定德、彭立、刘邵权、谢芳婷、曹梦甜、王旭熙, 2016: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经济地理》第3期。
29. 许庆、刘进、杨青, 2016: 《农村民间借贷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健康冲击视角的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30. 杨龙、汪三贵, 2015: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0期。
31.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 2011: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 《经济研究》第11期。
32. 杨文、孙蚌珠、王学龙, 2012: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经济研究》第4期。
33. 叶初升、赵锐、李慧, 2014: 《经济转型中的贫困脆弱性: 测度、分解与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一种微观评价》,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34. 叶静怡、武玲蔚, 2014: 《社会资本与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资源测量与因果识别》, 《经济学(季刊)》第4期。
35. 尤亮、刘军弟、霍学喜, 2018: 《渴望、投资与贫困: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36. 俞福丽、蒋乃华, 2015: 《健康对农民种植业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37. 张车伟, 2003: 《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 《经济研究》第1期。
38. 张栋浩、尹志超, 2018: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39. 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 2010: 《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第8期。
40. 周晔馨, 2012: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第7期。
41. Alwang, J., P. B. Siegel, and S. L. Jorgensen, 2001, "Vulnerability: A View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0015, <http://web.worldbank.org/archive/website01536/WEB/IMAGES/0115.PDF>.
42. Barrientos, A., 2007, "Does Vulnerability Create Poverty Traps?", CPRC Working Paper No. 76,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57/9781137316707_5.
43. Chaudhuri, S., J. Jalan, and A. Suryahadi, 2002,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 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Columbia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No. 0102-52, <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5149GF>.
44. Dercon, S., 2001,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196.3266&rep=rep1&type=pdf>.
45. Kühl, J. J., 2003, "Disaggregat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Analyzing Fluctuations in Consumption Using a Simulation Approach", Manuscrip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46.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7. Liu, J., T. Dietz, and S. R. Carpenter, 2007, "Complexity of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Science*, 317:

1513-1516.

48. Morduch, J., 1994,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221-225.
49. Singh, S. K., and G. S. Maddala, 1976, "A Function for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Econometrica*, 44(5): 63-70.
50. Woodridge, J., 2015,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Florence: Cengage Learning Press.
51.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2. Zhang, Y., and G. Wan, 2006, "The Impact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 on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4): 694-712.

(作者单位: ¹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²山西绿色发展研究中心;

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小 秦)

The Alleviation of Household-level Poverty Vulnerability Through Ability Enh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Taihang Mountai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Gao Shuai Shi Chan Tang Jianjun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reached a critical stage. Whether the vulnerable and marginal households can achieve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carefully examined. Due to a lack of capacity and rights,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o poverty cannot be ignored, making ability enh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crucial path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Empowerment is a prerequisite of ability enhancement, whereas ability enhancement is a reflection of empowerment. Based on household-level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aihang Mountai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sustained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enh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is applied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a sub-group regression analysis is utilized to account for the discrepancy in endowment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villages or household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both ability enh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econdly, insufficient capacity may cause non-poor villages to face a "new relative poverty" dilemma whereas insufficient empowerment may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shadow under the lamp" in non-poor villages. Thirdly, empowerment is more effective in alleviat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and empowerment of production rights and employment rights can reduc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households.

Key Words: Ability Enh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Poverty-related Vulnerability;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Poverty Alleviatio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